

曾巩诗歌疾病书写的多重隐喻及其消解

王友胜¹

【摘要】曾巩一生生活艰辛、仕途蹭蹬，数度罹患严重疾病，有时甚至濒临死亡边缘，又有数位至亲因疾而过早离世。这些来自自身与至亲的生理病患无时无刻不在困扰、折磨着曾巩，致使其齿发脱落、形体早衰。曾巩诗歌经常描述病态、反映病情、自称老病，有关衰老、孤独、贫穷与困顿的词汇频繁出现，流露出浓厚的“疾病情结”。其涉病诗歌题材独特，极具开拓性，而且还深藏着丰富的精神意蕴，隐喻着诗人生理、生存与政治等多重困境。在曾巩笔下，疾病书写重点不在展示病痛的过程与病体的医治，而在探讨疾病与衰、老、弱和死的关联，以隐喻人生的短暂、孤独与无常，隐喻家境的贫寒、生活的窘迫，隐喻仕途的沉浮与潦倒。曾巩没有因陷入人生困境而跌入精神谷底，与之相反，他通过良医除疾、友朋慰藉及山水释怀等多重方式予以解脱，以此稀释人生苦痛，回归生命原态，体验生命高峰。

【关键词】曾巩 生理困境 生存困境 政治困境 精神疗救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1）04—0135—06

疾病是人类身心体验的异态，“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1] (P86)}。疾病书写是诗人通过叙述自我或他者生理疾病，借以映照人生、隐喻内心的一种重要题材。古代诗人如刘祜、陶渊明、卢照邻、杜甫、白居易、李贺等的诗歌中，疾病书写的作品俯拾即是。宋代诗人中，长期处于“衰”“老”“弱”等亚健康状态的苏轼及为脾、胃、肺等疾病困扰，“少而多病”的苏辙最擅疾病书写，即便以文章见长的曾巩亦经常以诗写病，以病抒情，流露出浓厚的“疾病情结”。

曾巩一生生活艰辛、仕途蹭蹬，数度遭遇疾病的困扰，甚至濒临死亡边缘，又曾有数位至亲因疾而过早离世。曾巩因来自自身与至亲的生理病患，从而陷入生理、生存与政治等多重困境，对周边环境的体察特别敏感，对自身病痛的体悟较之常人更为深切。他的诗中描述病态、反映病情、自称老病的诗句不胜枚举。

曾巩现存的450余首诗歌中，有“病”字42个、“疾”字9个、“疴”字2个，“病眼”“病体”“病骨”“病人”“病发”“病躯”“病颜”“病身”“病敦”“病容”“贫病”“疾病”“疵病”“卧病”等有涉疾病与衰老、孤独、困顿、贫穷的词汇频繁出现，至于隐喻生理、心理“非常态”的“衰鬓”“华发”“落齿”“聋眊”等用语则更多。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疾病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或曰文学病理学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与不俗的成果，但学界有关曾巩涉病诗歌的研究尚付之阙如，从未有人关注，值得深入剖析。本文拟从这一独特视角切入，从生理、生存与政治等多重维度，揭示曾巩诗歌疾病书写中深藏的隐喻意义，探讨其排解病体疼痛与精神苦闷的方式。

一

作为生理或心理的一种“异态”，疾病由来已久，与人的衰、老、弱，甚至死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双方互为因果，是每一生命个体在生命旅程中无法回避的生理体验。曾巩短暂的一生常染重病，以致齿发脱落、形体早衰，对衰老病死等生理变化异常敏感，极度恐惧，其《再乞登对状》尝谓：“心思消缩，齿发凋耗，常恐卒填沟壑，独遗恨于无穷也。”^{[2] (P492)}当朝廷委任通修五朝大典时，他自觉身体“衰拙，惧不克堪”^{[2] (P494)}，害怕因此耽误大事。

作者简介：王友胜，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教授。（湖南湘潭 411201）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湖湘文学总集研究”（18YBA146）

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仅 27 岁的曾巩既已身患肺疾，病魔几夺其命，只得闭门疗养。他在《上欧阳龙图》的书信中说：“欲葬祖母后一至执事之侧，少慰其心，而自去夏属疾，至冬益甚，抵今未尽平复，未堪远役，又未能成其意。”^{[2] (P772)}可见，这场病魔折磨作者将近一年之久，以致无暇随侍恩师左右。作者去世前数月肺疾亦曾复发，大病一场，其弟曾肇《亡兄行状》载：“在职百余日，不幸属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2] (P795)}文中“在职”指曾巩元丰五年（1082）所任中书舍人一职，“遭家不造”语出《诗经·周颂·闵予小子》，原指周成王居父丧时自哀之辞，此喻指继母朱氏当年九月病逝京城。作者任上仅百余日即深陷病痛折磨，继母病逝后，扶柩南归，次年四月即病卒于归途江宁（今江苏南京）。

作者一生还曾经历十余位至亲的生离死别。他 8 岁时，生母吴氏年方 35 岁即于天圣四年（1026）病逝，祖母黄氏则于庆历四年以高龄逝于临川。就在曾巩患肺疾不久，其父曾易占因被诬落官，生活负担沉重，于庆历七年在幼子曾肇刚出生不久，九女德操才 4 岁的情况下，即病逝于离京城不远的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南）。同父长兄曾晬皇祐五年（1053）进士落选，年仅 45 岁即病逝于归途江州。二弟曾宰于熙宁元年（1068）四月卒于湘潭县主簿任上。

曾巩在《亡弟湘潭县主簿子翊墓志铭》中痛心地说：“其学行如此，于世用宜如何也？然位不过主簿，寿止于四十七，其非可哀也夫？”^{[2] (P634)}言语间透露出对曾宰宦途坎坷、英年早逝的哀伤之情。曾巩的十个妹妹中，一位夭折，长妹（嘉祐二年）、次妹（嘉祐四年）、八妹（嘉祐六年）、九妹（熙宁七年）在十余年间也先后离开人世。特别是在嘉祐六年（1061）后因其师欧阳修举荐至京师编校史馆书籍的九年间，除八妹早逝外，其元配晁氏及二个幼女亦先后病故。曾巩在治平元年（1064）五月所作《祭亡妻晁氏文》中抒发了亲人接连离世，作者不胜悲慨的心情。

他在为长妹写的《郢州平阴县主簿关君妻曾氏墓表》载：“于是时（按指嘉祐八年），余校史馆书籍，皆会京师，而余于其间再哭妹，又哭女与哭妻，忧患之接于余者，可谓多矣。”^{[2] (P638)}文中所指的“女”即晁氏所生长女庆老，于嘉祐六年十一月，3 岁而夭折。庆老去世后，治平三年九月，继室李氏所生幼女兴老，两岁而夭折。十余年后作者所作《二女墓志》一文回忆当时情境说：“予校书史馆凡九年，丧女弟，丧妻晁氏及二女。余穷居京师，无上下之交，而悲哀之数如此。”^{[2] (P636)}其丧亲之痛，曷其至哉。

曾巩不仅要承受自身各种病痛的折磨，还亲眼目睹这个大家族中多位亲人的不幸离世。唯其如此，作者对衰老病死等生理变化反应特别敏感，对因疾病磨难而导致的形体衰老，或因衰老而引发的各类疾病体验极其真切。他的涉病诗歌经常书写患者的脆弱心灵与羸弱躯体，隐喻时间的流逝、衰老的必然与死亡的迫近。其《寄王介卿》诗：“绸缪指疵病，攻砭甚针石。”^{[2] (P19)}寥寥十字，道出疾病对人精神与形体的戕害有甚针石的无情事实。在《不饮酒》一诗中，花、酒与戏谑原本都是人生的调味品与催化剂，可作者在饱经疾病折磨后，身体衰耗，白发垂须，已无心于此。他“不饮酒”“不善谐”“遇花少情思”，不顾世外花开鸟鸣，只管安坐蒲团，或退堂静卧，以为休心养身。诗中的“布谷”“提壶”皆鸟名。旧有布谷叫，谷雨（节气）到，降雨增加的说法，又有“提壶劝酒”的习俗。诗人此时无心花、酒，故反用旧典。

另外，他在《苦雨》中提到“病容”“华发”“病骨”“衰思”“白须”等词，特别是“自笑病容随步见”一句，栩栩如生地自画出诗人因病所致的龙钟之态与衰损之容。作者熙宁九年自襄州任上返回江西，权知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出发前撰诗《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中，“我初折腰五斗粟”^{[2] (P75)}句，指嘉祐四年曾巩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一事。作者初任此职离熙宁九年写作该诗相隔刚好 18 年之久，故曰“南北相望十八年”。诗人感慨时光如白驹过隙，对方处事淡泊旷达，而自己却久系官场，拘谨局促，行为极不自由。诗中自陈形体早衰而胆气减损，生理多病而黑发不再，人情冷暖、宦海风波，彼此不能互吐衷肠，自嗟作为知州的自己即使拥有宝马雕车，尚不及农夫坐骑黄牛的怡然自得。由此可见，在曾巩笔下，疾病书写重点不在展示病痛的过程与病体的医治，而将大量笔墨放在疾病与衰、老、弱和死的关联上，以隐喻人生的短暂、孤独与无常。

疾病与贫困可谓一对孪生姊妹，两者互为因果。人一旦患病，不仅形体衰损、精神萎靡，无法从事体力与脑力劳动，更因长期求医买药，家资耗尽，极易陷入生存困顿。南丰曾氏虽世代为儒，官宦不断，然至曾巩父亲曾易占时已门衰祚薄，所以如此，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即全家多人染病。曾易占一生仕途沉浮，景祐三年（1036）在信州玉山任上又曾受钱仙芝诬陷，坐法失官，家居十二年，庆历七年赴京师求职，至南京而病卒。曾易占原配周氏生子晬后，因病早逝；续弦吴氏（即王安石妻之姑祖母）生巩、牟、宰与一女，与他共同生活仅十一年即病逝；再娶朱氏，生布、肇与九女。曾易占罢官居家后，全家经济收入锐减，入不敷出。

曾巩成人时，不仅多位至亲染病离世，而且全家食口甚众，较之乃父，陷入更大的生存困境。他在写给老师的《上欧阳舍人书》分析个中缘由曰：“然亲在忧患中，祖母日愈老，细弟妹多，无以资衣食，恐不能就其学，况欲行其他耶！”^{[2] (P237)}作者如实地向欧阳修说出一时无法离家就学的实际困难；又在《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中曰：“余时（按指初娶晁氏时）苦贫，食口众，文柔食菲衣敝自若也。”^{[2] (P633)}虽为称扬亡妻生前德行，但也道出家庭经济拮据的缘由。

曾巩为九妹德操所作《仙源县君曾氏墓志铭》中亦有类同的表述：“吾妹十人，其一早夭，吾既孤而贫，有妹九人皆未嫁，大惧失其时，又惧不得其所归。”^{[2] (P636)}可见，曾巩当时面临的生存困境极其严重。为摆脱这一窘境，他在乃父离开人世之后，嘉祐二年中进士之前十年间，曾有过一段家居耕读的生活经历。其间虽有长兄，然曾晬病体衰弱，曾巩只好与继母朱氏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任。曾肇在《亡兄行状》中详细叙写了两人为摆脱生存困境所做的不懈努力。

曾巩后来因欧阳修之荐，在朝廷校勘古籍九年，虽有微俸，然接连丧妹丧女又丧妻，生活贫困、清苦之状亦不曾改变。可见，他的一生都在为衣食而忧，自始至终都为生存所困扰。他在悼亡诗《合酱作》中，详细叙述了元配晁氏在京师去世后，一家生活拮据，陷入极度贫寒的窘况。

曾巩的涉病诗中，疾病常与家境贫寒、生活窘迫等同时书写。诗中屡次出现“病”“疾”与“贫”“穷”“苦”等表达生存困境之词对举或合用的诗句。如他在给王安石的诗《寄王荆公介甫》中，“数病门稀出，常贫客少过”^{[2] (P724)}之句，即是很好的例证。王安石元丰三年改封荆国公，诗云“荆公”，又曰“数病”，故当作于曾巩卒前一年“在职百余日，不幸属疾”时期。此诗是对作者一生困于贫病、疾苦，仕途不畅、蹉跎潦倒的自我写照。

曾巩自己与至亲疾病频发，是生活陷于贫困的主要原因，即《祭亡妻晁氏文》所谓“迎医市药，我力为殫。”^{[2] (P530)}他在《辛卯岁读书》中，讲述时光荏苒，不经意间，自己就到了撑起全家生活重任的年龄。为了生计，作者奔走四方，萍飘蓬转，特别是庆历五年久病不愈，庆历七年家父去世后，抚育母、弟的责任令自己捉襟见肘。又在《羁游》中运用陶潜、杨雄之典，抒写因病致贫，因贫致窘，进而希望洗尽尘埃、归隐沧州的心情。另外，在《送刘医博》《雨中》《答裴煜二首》《简景山侍御》等诗中，也出现大量的与疾病与贫寒相关的诗句。他如此频繁地自陈病患，实际是在隐喻其人生面临的巨大生存困境。

三

曾巩诗歌的疾病书写不仅深藏着作者的生理与生存困境，而且还很好地隐喻了诗人有志不获骋，抑郁、苦闷的政治困境。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文说：“疾病被常常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1] (P65)}曾巩的古文虽先道后文，质朴儒雅，多学者气息，以致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取曾巩而舍王安石，然其大部分诗歌却能力避言理而侧重抒写人生失意之情。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人情》。这两首诗均抒发作者对岁月不居、功名难就的慨叹，叙写归隐江湖、吟赏风月的闲致，彰显出一个与古文中严谨平实、言理鲜情的曾巩完全不一样的形象。

曾巩因长期患病，心里面多愁善感，其四百余首诗歌中，“愁”字出现 18 次，“忧”字多达 46 个，这种“忧”“愁”等人生落寞的失意情绪大多因病所致，疾病肉体的疼痛造成其心里的异变与位移。可以说，他诗歌中的疾病书写内容是诗人一生政治遭遇与人生磨难的集中体现与缩影。如《初夏有感》开宗明义：“我从得病卧间巷，三见夏物争滋荣。”^{[2] (P20)}曾巩庆历五

年患肺疾，病卧闾巷，迄今凡“三见夏物”，故诗当写于庆历七年29岁时。全诗采用第一人称手法，自叙生平，特别是后半部分，作者感慨因身患肺疾，致使胸气短乏、筋骨疼痛、头目眩晕与身体羸弱。

在笔者看来，这些疾病症状与病痛体验，无不隐喻着诗人的仕途困境：一方面渴慕如孟轲、荀卿那样，成一代之学；但又自叹十年来奔波劳碌，饮食难以为继，形体憔悴疲乏，未老先衰，事功之业实在难酬。在诗的结尾，作者的思想情绪再度高扬，表示不忘初心，若一息尚存，仍矢志不渝。全诗情感真挚浓郁，起伏跌宕，将诗人身染疾病而仕途坎坷不平的内心苦闷和盘托出。作者的《代书寄赵宏》，以诗代简，堪称书写疾病与自陈人生的代表之作。

全诗为七言古体，洋洋洒洒，多次陈述病情，慨叹人生。从诗的后四句来看，作者当时所患之疾应为肺气肿。按现代医学的看法，肺气肿是指终末细支气管远端的气道弹性减退，过度膨胀、充气和肺容积增大或同时伴有气道壁破坏的病理状态。这种可怕的疾病曾经给青年曾巩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理恐惧，所幸的是曾经遇到神医巫彭，妙手回春，一度治愈了他的顽疾。

各种疾病带给诗人的身体疼痛和情感体验自然会在其心底留下较深的印痕，促使诗人以疾病的思维方式思考现实人生。因此，作者在其涉病诗中，有时也会对自己不顾健康状况，过分迷恋功名而进行自嘲自讽，在《题宝月大师法喜堂》中，诗人就曾深刻地自我反省，自谓病体缠身，尚南北奔波，与一般“陋儒”无异。在《寄王荆公介甫》中，他讲述自己因为疾病与贫寒，既错过了经纶世务，也没有享受到耕钓的乐处。与人生受挫感、衰落感相伴随的是人生的孤独感，单调、枯燥的卧病生活，无法参加政治活动或群体集会，孤独、寂寞的情感自然无法避免，但也由此拥有较长的休息时间来感受周边环境的变化，以使病情得到缓解。其《送欧阳员外归颍滁州舍人》中，诗人描述了自己卧病静养的怡然，凉夜深秋孤寂，感受在和风凉月下病体的轻松自如。曾巩诗歌中的疾病书写，虽然不断展现自己的身体病痛，却无时无刻不在表征其人生的坎坷，隐喻其政治失意后的孤独感、受挫感与窘迫感。

四

现代医学心理学认为，疾病与文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诗人在进行疾病书写时，其身份不经意间发生较大变化，即创作主体由健康状态的“常人”转变为“病人”，其创作心理也由常态而进入病态，其对周边环境的反应会比常人更敏感，从而变得多愁善感、心理失常或超常。就病人而言，患者会因疾病的反应与病人角色的认同导致主观感知异常，其注意力会更多地由外部世界转向对自身病痛的体验，“情绪不稳定”，“控制力不强，易激怒”^{[3] (P142)}，经常处在一种焦灼、压抑、沉闷的状态。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面对疾病，诗人较之普通患者，可能会多一种自我排解的方法，更易消解病体与精神的痛苦，表现出较之普通患者更为强大的生命意志与乐观情怀。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有人已作出了这样的许诺，即疾病能够被战胜。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变得不那么真实了。”^{[1] (P51)}又说：“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1] (P5)}汉代枚乘的《七发》是一篇较早的涉病文学作品。文中假设楚国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以音乐、美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及“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等七法疗救，虽然最后让太子“据几而起”“怵然汗出，霍然病已”的是方士的“要言妙道”，实际上七法均有心理疗救或曰精神疗救的意味。苏轼《病中游祖塔院》诗中“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二句，即是古代诗人以“得闲”“安心”等精神良药消解病人肉体与精神双重痛苦的极好诠释。曾巩因病陷入多重困境，他的涉病诗歌有时也扮演着良药的角色，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和精神抚慰，由此具有消解疾病痛苦的特殊功效。在曾巩诗歌的疾病书写中，这种“疗救”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作者会以诗为媒介，直接表达病痛被良医解除或生活、仕途稍有起色后的喜悦与欣慰之情。如《送刘医博》一诗，先叙自己“久病”的愁绪、“穷居”的寂寞及“山城”周边环境的衰飒，然后笔锋陡转：“临汀刘君落落者，六伎绝伟如天资。潜心密与造化会，布指复有精灵随。马蹄所至病魔屈，我于此时欣得之……刘君与我德至大，拱壁巨鼎非酬裨。”^{[2] (P22-23)}诗中赞扬名医刘博手到病除，堪比汉代张仲景悬壶济世的高超医技，抒发自己欣得良医，“肺”“脾”之“沉疴”被医治后的无比快

慰之情。作者长期“负疴”，为病痛所折磨，有所谓“心胆耗”“筋力伤”，以致大病初愈，还惊魂未定：“至今惊未定，生还乃非常。忧虑心胆耗，驰驱筋力伤。况已近衰境，而常犯风霜。驱之久如此，负疴固宜长。”^{[2] (P54)}所以，曾巩对刘博的感激应该发自肺腑。另外，曾巩于熙宁四年由越州通判改知齐州，其间有诗云：“何须辛苦求天外，自有仙乡在水乡。”^{[2] (P102)}“最喜晚凉风月好，紫荷香里听泉声。”^{[2] (P109)}作者前此虽长期在京城，然仅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微职，外放越州，亦为通判，知齐州是作者从政以来第一次主政一方，仕途一时顺畅所致的欣喜之情成为淡化其疾病苦痛的良药。

其次，曾巩因病困守家庭时，缺乏政治活动与群体雅集，极易触发孤独、寂寞的情绪，而邀请友朋造访，围炉夜话，则可解除内心的索寞、病疼的折磨，如《东轩小饮呈坐中》。该诗首句曰“二年委质系官次”^{[2] (P58)}，故当为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的第二年（嘉祐四年）作。作者此时尽管微官薄禄，盘中只有腥咸海鱼、酸涩野果，但谈笑有鸿儒，来访友朋间彼此把酒品诗、畅谈不已，“鄙吝”之心顿减，“病体”之疼全无。由此可见，诗人在疾病书写时，能够凭借友朋慰藉，对其因疾病而致的恐惧心理进行消化、排解，其诗中的情绪并不是悲挽、颓废、衰弱与无奈，而是哀而不伤，整体上保持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再次，曾巩在经年痼疾、难以痊愈的情况下，为排解疾病所致的折磨，往往会投身自然，亲近山水林泉，饮酒品诗，以此走出疾病的困境，超越生理意义上的病痛。元代刘壘《隐居通议》卷七曰：“（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4] (P74)}其实，这个评价并不客观。曾巩在诗中屡屡自陈借景疗疾的快慰，如“林下病人毛骨醒，目爱清光不知己。”^{[2] (P36)}“眼无尘土境殊清，一绕芳蹊病体轻。”^{[2] (P86)}“我病一洗濯，怀抱失所憎。”^{[2] (P9)}“一见云山病眼清，野僧勤动水边迎。”^{[2] (P730)}所谓“病人毛骨醒”“病体轻”“病眼清”，无不彰显出山水林泉对化解诗人病痛的巨大疗效。曾巩的这一写作特点在《简如晦伯益》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又在《冬晓书怀》中说道：“昔时气锐过奔浪，今日病减真无蝇……不容当时孔何病，更誉众列颜非朋。坐知天下书最乐，心纵尘土酒可凭。莫过二事贤且圣，胡不学外常腾腾？”^{[2] (P36-37)}在作者看来，天下至乐之事在读书与饮酒，只要书、酒不离手与口，自然会“病减”形释，心里感到无穷快慰。其实在现代医学看来，赏景、读书、饮酒均无法真正治疗疾病，能够排解的只是因病而致的肉体与精神痛苦。

综上所述，疾病在诗人那里，不只是生理上的痛苦，也不仅是一个医疗与卫生的概念，从隐喻与象征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文化现象，隐喻与象征着疾病书写者的生存环境与政治处境，是众生万象的一个缩影。病态之于诗人的生态、心态与创作，均有着特殊的意义。诗歌描写主人公的疾病，描写患者脆弱的心灵和羸弱的躯体，却隐喻着时间的短促、生命的脆弱与政治的窘迫，或许还预示着衰退的必然、死亡的迫近和时代的终结。因此，阅读曾巩有涉疾病的诗歌，我们当从生理困境、生存困境、政治困境与精神疗救等多维度去理解，剔去附着物，明视其本真之貌，才不至于胶柱鼓瑟，曲解诗人隐藏其中的深衷密意。

在北宋诗坛，曾巩算不上大诗人，但在写作上，也有其独到的一面。他的涉病诗歌，非惟拓展了宋诗的题材范围，亦为解读、阐释文学与疾病的互渗关系提供了绝好案例，具有较好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苏辙《曾子固舍人挽词》赞其：“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5] (P243)}曾巩不仅是儒者，还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大家。他的涉病诗隐喻广泛而深刻，蕴含着作者超乎生理疾病之外的社会、文化与人生等丰富内涵。作者没有因病而陷入精神困境，从而跌入谷底，与之相反，他通过良医除疾、友朋慰藉及山水释怀等多重方式予以解脱，以此稀释人生苦痛，回归生命原态，体验生命高峰。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宋）曾巩. 曾巩集[M]. 陈杏珍，晁继周，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8.

[3]姚树桥. 医学心理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4] (元) 刘壎. 隐居通议 (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 (宋) 苏辙. 苏辙集 [M]. 陈宏天, 高秀芳,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